

【特稿】 Feature Article

## 朱子在宋明儒學的地位重探

### Further Reflections on the Key Position Chu Hsi Occupied in Sung-Ming Neo-Confucianism

劉述先

Shu-Hsien LIU\*

**關鍵詞：**濂、洛、關、閩，道統，陽明致良知教，蕺山誠意慎獨教，現代新儒學，理一分殊

**Keywords:** Lien, Lo, Kuan, Min, Tao-t'ung, Yang-Ming's teachings of extending innate knowledge of the good, Chi-shan's teachings of sincerity of the will and keeping vigilance in solitude, contemporary Neo-Confucianism, li-i-fen-shu

---

\*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兼任研究員／政治大學講座教授。

## 摘要

- 一、引語
- 二、朱子對於道統的建構
- 三、陽明與蕺山對於朱子道統觀的繼承與修正
- 四、現代新儒學有關道統的闡述與拓展
- 五、結語

## Abstract

Chu Hsi's key position in Sung-Ming Neo-Confucianism is related to his effort to establish the orthodox line of transmission of the Way (Tao-t'ung). In the famous Preface to his *Commentary on the Doctrine of the Mean*, he traced the line back to ancient sage-emperors, Confucius and Mencius, then to Sung Neo-Confucians. He and his friend Lü Tsu-ch'ien compiled the *Neo-Confucian Anthology: Reflections on Things at Hand* in which he established the lineage of Lien (Chou Lien-hsi), Lo (Ch'eng Ming-tao and Ch'eng I-chuan), Kuan (Chang Heng-chü), and Min (himself). The posterity accepted this lineage but gave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s. In the Ming dynasty, Wang Yang-ming promoted his teachings of extending innate knowledge of the good (liang-chih), and Liu Chi-shan his teachings of sincerity of the will and keeping vigilance in solitude. The contemporary Neo-Confucianism continued this line, gave Chu Hsi's "li-i-fen-shu" (one principle, many manifestations) totally new interpretations to face the challenge of developing a global ethic in the 21st century and the new millennium.

宋明儒學的主流無疑是理學。<sup>1</sup>理學有廣狹二義，廣義兼賅程朱理學與陸王心學，狹義專指伊川、朱子一系的理學。朱子一向被推崇為集大成的地位。<sup>2</sup>朱子（1130-1200）在逝世時雖因政治原因被誣為偽學，但很快到宋理宗時就得到平反。一三一三年元代科舉以朱子的《四書集註》取士，一直到清末（1905）廢棄科舉為止，七百年來他的地位被視為孔子以後一人，是一點也沒有誇張的。令人驚異的是，大陸自文革（1966-1976）以後撥亂反正，走開放的道路，朱子，連帶儒學，又再一次得到平反。一九八二年七月在檀島開國際朱熹會議，個別中國思想家在西方受到這樣的殊榮可謂空前。拙著《朱子哲學思想的發展與完成》分送與會學者，不期而然讓我變成了國際知名的朱熹學者。<sup>3</sup>二〇〇三年余英時兄出版大著：《朱熹的歷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開拓了新的視域。<sup>4</sup>二〇〇六年此書為他贏得了國際注目的克魯吉獎（John W. Kluge Prize），人文方面的中文著作受到肯認，這還是第一次。而廿多年來，有關朱熹的學術會議一個接著一個，今（2008）年十月廿五至廿六日復旦開「宋代新儒學的精神世界——以朱子學為中心」的大型國際會議，邀請我作一場主題演講。<sup>5</sup>其實我在出版朱子一書以後，基本思想並無改易，然而針對新觀點新視域新資料的提出，還是有必要作出回應，解消來自各方面的疑慮。

- 
- 1 我對宋明儒學的概述，參考我在二〇〇五年在新亞書院所作的「錢穆講座」第二部分：〈「宋（元）明儒學」〉，《論儒家哲學的三個大時代》（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8年）。此書第一部分為「先秦儒學」，第三部分為「現代新儒學」。
  - 2 錢穆先生即對朱子推崇備至，著《朱子新學案》（臺北：三民書局，1971年）五大卷。牟宗三先生對朱子思想持批判態度，著《心體與性體》（臺北：正中書局，1968-1969年）三大卷，因朱子的「理」只存有而不活動，已偏離了北宋三家：濂溪、橫渠、明道的直貫思路，而繼承伊川，另外開創了一條橫攝思路，造成了「別子為宗」的現象。但朱子的綜合雖不盡理想，牟先生並未否認朱子在事實上佔據了「大宗」的地位。
  - 3 劉述先：《朱子哲學思想的發展與完成》（台北：臺灣學生書局，1982年初版，1984年修訂再版，1995年增訂三版）。此後，我應邀以英文撰寫百科全書的英文朱子條目，例如："Chu Hsi," *Encyclopedia of Ethics*, edited by Lawrence C. Becker (New York: Garland Published Inc., 1992), vol. 1, pp. 158-160; "Zhu Xi (Chu Hsi)," *Encyclopedia of Chinese Philosophy*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pp. 895-902.
  - 4 余英時：《朱熹的歷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臺北：允晨，2003年）二大卷；我曾寫長文加以評論，英時兄也詳加回應，往復數回。相關文獻見：《九州學林》，第1卷，第2期（2003年冬季號）、第2卷，第1期（2004年春季號）、第2卷，第2期（2004年夏季號）。
  - 5 大陸方面以我為現代新儒家研究朱子的代表之一。陳代湘：《現代新儒學與朱子學》（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以馮友蘭、錢穆、牟宗三、劉述先四人為中心。方克立〈序〉說我的朱子一書「總結了前輩新儒家的朱子學研究成果，並在此基礎上提出

我一向認為朱子學是聖學的一支，自幼就關心「為己之學」。不像希臘哲學的源頭由宇宙論的玄想開始，注重邏輯思辨，建立通則，亞氏以理論為先，然後才應用到人生，落實到道德倫理。但朱子師從李延平，得授「理一分殊」之旨，長年參究中和，最後才回歸伊川的「涵養需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兼顧涵養、省察，近四十歲才找到自己成熟的思路，建立了一個心、性、情的三分架構，以及理、氣二元不離不雜的形上學，其詳請參閱拙著，此處不贅。

朱子所以為後儒所宗，一個重要的原因在他建構了道統，在哲學上提出了一整套東西與二氏（老、釋）抗衡。唐代的韓愈早就提出了道統的觀念，回歸孟氏，但他只能在文化的層面闢佛，所以朱子並沒有把他歸入道統的統緒，而跳過漢唐，直接回到先秦。在〈中庸章句序〉中，他說：<sup>6</sup>

道統之傳有自來矣。其見於經，則「允執厥中」者，堯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自是以來，聖聖相承〔……〕若吾夫子，則雖不得其位，而所以繼往聖、開來學，其功反有賢於堯舜者。然當是時，見而知之者，惟顏氏、曾氏之傳得其宗。及曾氏之再傳，而復得夫子之孫子思〔……〕又再傳以得孟氏〔……〕及其沒而遂失其傳焉。〔……〕故程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續乎千載不傳之緒〔……〕。

朱子根據程子，引十六字心傳：「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源出古文尚書〈大禹謨〉，清初閻若璩考證為偽作，似乎動搖了道統的基礎。但我曾借田立克（Paul Tillich）的說法，分別「耶穌學」（Jesusology）的考據與「基督學」（Christology）的信仰，指出朱子建立

---

了『理一分殊』的睿見。」如果前輩新儒家指的是港台新儒家的話，這樣的說法是不錯的。因為我無取於馮友蘭以新實在論的「共相」釋朱子的「理」的說法，但結合了錢穆先生的考據與牟宗三先生的哲學反思，加以融貫然後提出了我自己的統觀。

6 〔宋〕朱熹：《朱子文集》，卷76。

道統屬於「信仰」的層面，不是「考證」可以推翻的。有關耶穌其人的考證缺少確定性，但耶穌基督釘十字架為人類贖罪之後復活的信仰都是絕對的。同樣，古聖王的傳說雖缺少確定性，「危、微、精、一」的心傳對道學者而言卻是絕對的。<sup>7</sup>

宋明理學的共識，據牟宗三先生的說法，是「天道性命相貫通」。<sup>8</sup>宋明新儒學等同《易》的生與孔孟的仁，突破了先秦儒學의 故域，發展了規模宏大、思入精微的天道論與心性論，這才可以面對二氏，特別是佛家的挑戰。朱熹精心地建構了我們如今熟悉的濂（周濂溪，1017-1073）、洛（程明道，1032-1085；程伊川，1033-1107）、關（張橫渠，1020-1077）、閩（朱子本人）之統。他和呂東萊合編《近思錄》共十四卷，由「道體」到「觀聖賢」，選錄了北宋四子的文字，正如宋代葉采（平巖）《集思錄集解》原序曰：<sup>9</sup>

嘗聞朱子曰：四子，六經之階梯；《近思錄》，四子之階梯。蓋時有遠近，言有詳約不同，學者必自近而詳者，推求遠且約者，斯可矣。

與朱子同輩的學者如張南軒（1133-1180）、呂東萊（1137-1181）均已早逝，竟讓朱子這樣一個僻處福建的窮儒，成為眾所敬仰的一代儒宗，可謂異數！<sup>10</sup>

朱子建構濂、洛、關、閩的線索深具卓識。他把藉藉無名的濂溪推尊為宋明理學的開祖，因為他激賞濂溪的〈太極圖說〉，然而這篇文章的第一句話：「無極而太極」就引起了巨大的爭議，由於「無極」一詞出自

7 參見拙著：《朱子哲學思想的發展與完成》，頁426-427。

8 牟宗三：《心體與性體》，第1冊，頁417。

9 引自〔宋〕朱熹（編）：《近思錄》（臺北：商務印書館，1967年）。

10 朱子不似南軒早慧、東萊駁雜，一心向道，強探力索，結合舊學新知，完成程朱理學的哲學系統，所以成其大。而余英時兄另闢蹊徑，爬梳史料，恢復了慶元黨禁在歷史上失落的一頁，發現朱子雖長年在野，卻不懈努力，希望能夠「得君行道」，為道學一派宗奉的政治領袖，實足令人驚異，參見余英時：《朱熹的歷史世界》。

《老子》，非儒家用語。朱子以「無形而有理」解釋這一句話，在哲學上可以言之成理。而濂溪只是二程的家庭教師，明道「天理」二字乃是自家體貼出來，是理學真正的開創者，對於濂溪並不特別推崇。但後世卻接受了朱子建構的這一條線索，牟宗三先生即肯定濂溪第一個通過《易傳》與〈中庸〉接上孔子的睿識，把漢儒的宇宙論轉化成為宋儒生生的創造論，由「誠」去把握天道，開啟了內聖之學的規模，不再像漢易把注意力集中在外在象數的那一套。接著應該講橫渠，但因門弟子謂他自認聞道遲於兩個表姪，所以才先述洛學，其實伊川明白否認橫渠從學的說法，只因橫渠的興趣廣泛，思想駁雜，難以掌握，才加以移後。他是個極富有原創性的思想家。他的〈西銘〉與〈太極圖說〉一樣，有巨大的影響力。文章講「民胞物與」，歸結於「存吾順事，殁吾寧也。」楊龜山懷疑此文講墨家兼愛之旨，伊川給與回應，首次提到「理一分殊」的說法，以後成為宋明儒的共法。伊川以此文為孟子以後未見的大手筆，但二程都批評橫渠《正蒙》講「清、虛、一、大」，表達未醇，雖然是基於誤解，然而橫渠有些滯詞，也是無可否認的事實。牟宗三先生特別稱道他的〈誠明篇〉，揭示了「天道性命相貫通」的睿識。他又劃分德性之知、見聞之知，天地之性與氣質之性，也大有功於聖門。朱子更突出「心統性情」一語（引入《近思錄》卷一），認為遠超過胡五峰（1105-1161）心性對揚的說法，後來即以此為指引，建構了他的心、性、情三分架局。

至於二程，朱子一向學宗程子。而二程兄弟年齡只差一歲，雖然個性春陽秋殺，差別很大，但對道學的擔負卻完全一致。兩兄弟之間也不覺得彼此有什麼差異，所以二程語錄，有很大一部份並未分別明道語、伊川語。馮友蘭自詡他的哲學史的一個成就是指出明道的思想是主觀唯心論、伊川的思想是客觀唯心論。且不說這些只是浮辭，並無實義，一直要到牟宗三先生在他的大著：《心體與性體》才逐條分別語錄，確定明道為一本之論，伊川則是理氣二元不離不雜的架局，這才可以看到他的深湛的功力。朱子所繼承並進一步大肆拓展的正是伊川的思路，全面建構了一整套理氣二元不離不雜的形上學，而成為程朱理學的功臣。深入一層探究，朱子並不契於明道的思想，故《近思錄》未收錄明道的〈識仁篇〉，以之為

渾淪、難看（不好懂）。當然朱子對明道還是保住表面的尊崇與敬仰，稱贊〈定性書〉突顯了性的超越性。而二程的「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的論斷，《近思錄》也歸之於明道（卷二）。但牟宗三先生指出，北宋三家（濂溪、橫渠、明道）的「理」既存有不活動，是一種直貫的思路。伊川與朱子卻以「理」只存有不活動，理要掛搭在氣上才能運作，而成就了一種歧出於正統直貫思想即體即用的橫攝思路，通過〈大學〉格物、致知、窮理的汎認知主義的思想，而造成了「別子為宗」的奇特的現象。牟先生以道德「自律」、「他律」分判兩宗思路不免引起爭議，但二者確有重大的差別則是不容爭辯的。孟子「盡心、知性以知天」的思想為陸、王心學所繼承，朱子卻以〈大學〉解《孟子》，逆轉成為「知性（理）、盡心（氣）以知天」，明顯不符合孟子直貫的思路。<sup>11</sup>但朱子的學問博大精深，無有匹敵者，在世時已有眾多生徒景從，身後更被奉為正統，良有以也。

象山（1139-1193）雖在朱子生時就提出挑戰，造成朱陸異同的學術公案。但他直承孟子、格局不夠宏大，且英年早逝，根本不足與朱子抗衡，到了明代，已經湮沒無聞，王陽明（1472-1529）才為他刻文集鳴冤，不能因為他曾與朱子爭辯，就被誣為禪。陽明年輕時格竹子雖是基於對朱子的誤解，但他一直對流行的朱學不契，到龍場頓悟，才開始了自己的思路，而歸結於「致良知」。<sup>12</sup>我曾著文說明，陽明的精神雖繼承孟子、象山，提問題的方式卻通過朱子的轉折，他之恢復〈大學〉古本即是明顯的例子。由此可以清楚看到陽明哲學之朱子思想淵源。<sup>13</sup>總之，陽明意存調停，故在晚年編印：《朱子晚年定論》，不想未能平息爭論，反而引起更大的爭

11 [清]黃宗義：《孟子師說》，根據劉蕺山的說法駁斥朱子的觀點，參見拙著：〈論黃宗義對於孟子的理解〉，《黃宗義心學的定位》（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年），頁133-147；原刊於《鵝湖月刊》，總295期（2001年1月），頁2-17。

12 參見拙著：〈論王陽明的最後定見〉，《儒家思想意涵之現代闡釋論集》（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0年）；原刊於《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11期（1997年9月），頁165-188。梨洲《明儒學案》不把「致良知」當作陽明的最後定見其實是別有用心，本文曾詳加辨正。

13 參見拙著：〈論陽明哲學之朱子思想淵源〉，《朱子哲學思想的發展與完成》（增訂版附錄）；原刊於《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15期（1984年）。

議。總結來說，陽明接受了朱子建構的道統，回歸濂溪、明道，旁置朱陸，各有所取，各有所棄。陽明絕無意也不可能切割與朱子的關連。

至於劉蕺山（1578-1645），是王學的修正派。蕺山與陽明一樣接受朱子所建構的道統，但因他主靜，更突出濂溪、明道的地位，但他也無意貶抑朱子對聖學的貢獻。現行本《宋元學案》即引述了蕺山對朱子思想的闡釋。由現在的理解著眼，無論由哲學（牟宗三）的觀點，或者由思想史（錢穆）的觀點來看，都顯得一無是處。但無疑朱子被肯認為聖學的一個極重要的環節。而蕺山的思想由陽明轉手，也對〈大學〉提出了一種不同的闡釋。蓋蕺山之學乘王學之弊而起，反對浙中龍溪的虛玄而蕩、泰州心齋的情識而肆，拒絕講見成良知，免致滿街皆聖人的泛濫，而「歸顯於密」，建立「誠意慎獨教」，所謂「意根最微，誠體本天」，突顯意的主宰，不與念的遷流變革混為一談。他的弟子黃宗羲（1610-1695）繼承乃師的思緒，乃以陽明的致良知教為權法，期盼蕺山的終教引領天下。不幸時代精神有了根本的變化，明末清初發生典範轉移（paradigm shift），學者群趨「文獻考據」、「經世致用」、「達情遂欲」之學，梨洲都有分興波助瀾，導致宋明理學自此急遽衰微，淪為朝廷利用的意理。正因為梨洲不期而然成為宋明儒學的殿軍，終結了一個時代，又下開了另一個時代，故我以之為一位悲劇性的人物。<sup>14</sup>

一九一二年清廷覆亡，民國肇建，制度的儒家（institutional Confucianism）劃下句點。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成為一個象徵，揭櫫「全盤西化」的旗號，引進德先生（民主）、賽先生（科學），打倒孔家店，把一切反動、落後、腐敗的根據歸之於儒家。反傳統成為廿世紀中國思想的主流，激進主義當道，一九四九年大陸易幟，創建中華人民共和國，把國民政府趕到臺灣，僻處海隅，因韓戰的爆發而獲得苟安，成為海峽兩岸長期對峙之局。一九六六至一九七六大陸文革，在毛澤東與四人幫的倒行逆施之下，批林批孔，務求徹底剷除儒家傳統文化的根源。一直要到毛死後，鄧小平撥亂反正，採取開放政策，大陸經濟才得逐漸復甦。到了今

14 參見拙著：《黃宗羲心學的定位》。



日，外匯存底僅次於日本，在近年來引發了「大國崛起」的討論和爭辯。大陸雖仍堅持共產黨的統治，意理也相對地開放，孔子與儒學也均得到平反。我一貫認為，「儒家」是一個複雜的概念，不加分疏，難以作出有意義的討論。我習慣採取一種三分法：<sup>15</sup>

- 一、精神的儒家（spiritual Confucianism），這是指孔孟、程朱、陸王的大傳統。
- 二、政治化的儒家（politicized Confucianism），這是指由漢代董仲舒、班固以來發展成為朝廷意理的傳統。
- 三、民間的儒家（popular Confucianism），這是在草根層面依然發生作用的信仰與習慣，重視家庭、教育的價值，勤勞節儉，雜以流俗的信仰。

三者如今都表現強大的活力。亞洲四小龍（港、台、星、韓）與日本、中國都有儒家傳統的背景。星加坡的李光耀，大陸的江澤民（以德治國），胡錦濤（和諧社會）都是政治化儒家的顯例。精神的儒家才是我們關注的重點所在。有趣的是，很少人注意到現代新儒學如鳳鳥般浴火重生的契機正在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發生的同時。一九一七年梁漱溟進北大教書見校長蔡元培，就說要為孔子、釋迦說話。他構思和寫作《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可以溯回到一九一九年六月。新儒家為何那麼快就能由灰燼中復生？很明顯，梁所恢復的正是我所謂「精神的儒家」，與魯迅〈狂人日記〉所譴責的「吃人的禮教」完全不是同一回事。美國學者艾愷（Guy S. Alitto）曾著書稱梁漱溟為「最後的儒家」，<sup>16</sup>後來才發現他只是現代新儒學這個思潮的一位先驅人物。大陸於一九八六年國家教委七五規劃，確定「現代新儒學思潮」為國家重點研究項目之一，由方克立、李錦全主持，為期十年。<sup>17</sup>一九九三年，臺灣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也開始做以三年

15 參見拙著：〈儒學的理想與實際——近世東亞發展之成就與限制之反省〉，《儒家思想意涵之現代闡釋論集》；原刊於《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8卷，第3期（1998年9月）。

16 Guy S. Alitto, *The Last Confucian: Liang Shu-ming and the Chinese Dilemma of Moderni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9).

17 參見方克立：《現代新儒學與中國現代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

為一期的「當代新儒家」研究，到現在還在延續。最初大家根本不知道誰應該包括在這個思潮裡面，後來經過廣泛討論，大陸方面才提出了一個十五人的名單。這個名單雖不很理想，但勉可接受。我綜合了各家的說法，提出了一個「三代四群」的架構如下：

第一代第一群：

梁漱溟（1893-1988）、熊十力（1885-1968）、馬一浮（1883-1967）、張君勱（1887-1969）。

第一代第二群：

馮友蘭（1895-1990）、賀麟（1902-1992）、錢穆（1895-1990）、方東美（1899-1977）。

第二代第三群：

唐君毅（1909-1978）、牟宗三（1909-1995）、徐復觀（1903-1982）。

第三代第四群：

余英時（1930-）、劉述先（1934-）、成中英（1935-）、杜維明（1940-）。

「現代新儒家」（Contemporary New Confucianism）是廣義的大陸流行的說法，臺灣則流行狹義的「當代新儒家」（Contemporary Neo-Confucianism）的說法，開祖為熊十力，第二代為唐、牟、徐，第三代為杜維明、劉述先。這裡自不能詳細加以討論，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參閱拙著：《論儒家哲學的三個大時代》，有關現代新儒學的部分。

馮友蘭聲稱他以現代西方的觀念闡釋朱子的理學，把「理」解釋成為新實在論（Neo-Realism）的「共相」（universals）。他的《新理學》只談理、氣，不談心、性，明顯偏離了宋明儒「為己之學」的思緒，不能說是善繼朱子的睿識。熊十力則由唯識論翻出來，著《新唯識論》，回歸大《易》生生之旨，分別「性智」（良知）與「量智」（見聞），接上陽明心學的線索。在哲學上，第二代的唐、牟給與充量的發展，成為當代新儒家的主流。尤其牟宗三可以說是當代新儒家最富有原創性的思想家。他判

朱子為「別子為宗」，發前人所未發。但他激賞象山直貫的思路，又盛贊龍溪四無教為儒家思想中相當於佛家圓教思想的完成，不免偏向一邊，未能正視王學末流衍生的弊病。我對牟先生的深刻透闢十分佩服，但卻不是照著講，而是接著講。我認為象山是宋明理儒學內的頓教，朱子是漸教，分別有其定位，不可偏向一邊。到了今天，第二代新儒家承繼道統，肯定由孟子以迄陽明突顯的良知，又由學統的擴大以吸納西方的科學，政統的拓展以吸納西方的民主，這個大方向無疑是正確的。而進入新的世紀與新的千禧，正如孔漢思（Hans Küng）所指出的，又面臨一個新的「典範轉移」的時代，必須大聲疾呼推動全球意識的覺醒。<sup>18</sup>孔漢思提出警告，沒有宗教之間的和平，即沒有世界的和平，信然。史威德勒（Leonard Swidler）更戲劇化地宣稱，「不對話，即死亡」。今天我們不能只講多元主義（pluralism），那樣不免分崩離析，解決不了不同的宗教信仰、族群、國家和平共處於一個狹小的地球村的大問題。我們必須由每一個精神傳統內部去找根源，存異求同，才能覓得彼此之間契合的機緣。譬如學者發現，由古至今，每一個精神傳統都可以找到「金律」（golden rule，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或己立立人，己達達人）的不同的表達。我指出，由方法論上講「歸納」（induction）的「取同略異」是不行的，必須給與「理一分殊」以嶄新的闡釋，才能「存異求同」，找到交流互動的實效。<sup>19</sup>而朱子的睿識到今日還有其時代的意義。<sup>§</sup>

---

18 Hans Küng and Karl-Josef Kuschel (eds.), *A Global Ethic, The Declaration of World's Religions* (London: SCM Press, 1993); Leonard Swidler (ed.), *For All Life: Toward a Declaration of a Global Ethic: An Interreligious Dialogue* (Ashland, Oregon: White Cloud Press, 1999).

19 參見拙著：《全球倫理與宗教對話》（臺北：立緒文化，2001年）；簡體字版（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

§ 本文為宣讀於「臺灣朱子學研究協會成立大會」（臺北：2008年10月12日）之專題演講。